

92年前,当文学研究会呱呱落地时,曾经摄影一帧留念。由其原版洗印出的照片,现有一张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它原属郑振铎所有,郑亲手为它命名并题签:“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一九二一、一、四、于: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***(此处为一孔洞,字与纸一同被挖去——笔者注)惠存。弟郑振铎赠”,并在照片的上、下空白处对应着照片中人的位置写下了他们的姓名,自左至右依次是:(前排)郭沫若、杨伟业、黄英、王统照、瞿世英、易家维、(中排)江小鹣、白庸、许光迪、范用余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(后排)王星汉、郑振铎、宋介、许地山、李晋、苏宗武、耿济之、孙伏园。一群志存高远的年轻人,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之梦济济一堂,共同筹划着意在旋转云坛乾坤的宏图伟业。一张照片,留住了一场风云际会。

然而照片摄入的并非文学研究会之初的全班人马,最起码缺少了瞿秋白、周作人、沈雁冰、叶圣陶等四员“大将”。但即便如此,所摄也已经是“诸·家·荟萃”:朱希祖——史学家,蒋百里——军事家,孙伏园——编辑家,耿济之——翻译家,瞿世英——教育家,黄英(庐隐)——作家,许地山——杂家(他不仅写小说写散文,还研究宗教史,关注印度哲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,掌握梵文、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、甲骨文等等)。他编的梵文辞典虽因各种不可抗力而夭折,但他为此制作的一大摞梵文词条卡片已于1990年代后期成为文学馆的永久收藏,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位——集作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、文学史家、艺术史家、收藏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郑振铎——文学研究会的成立,正是他精心运筹多方活动的结果。

郑振铎(1898—1958),浙江温州人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,他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,遂以学生代表身份投身革命洪流。待运动落潮,又回到学校。依旧是学生,依旧高高瘦瘦的,依旧带着深度近视眼镜——形容依旧,思想却无法“依旧”了。他在憧憬,在探寻,在思考着怎样把新文学家们组织起来共谋发展。这是一项事业,一个人是干不成的。郑振铎深明此理,所以谋求同道成为他千里之行的第一步。1920年中的多少个傍晚,他都是约了同样不喜欢在斗室中闷坐的朋友共度过去。他们边走边谈,徘徊于北京沙滩一带。“一谈就扯得很远,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比较多,言必称三代的毛病,在当时似乎要犯得少一些。有时又拉得太近,尤其在一俯一仰,月光如水,人影在地,当前景色成为谈话资料的时候,有时恬适,有时感慨,甚至有时也吐些狂言……当然,所谈的,也有一部分计划怎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。”(见郭绍虞《“文学研究会”成立时的点滴回忆》)参加交谈的,不外瞿秋白、耿济之、瞿鹤农、王统照、许地山等,后来又加入了郭绍虞。交流对撞出了火花,见解达成了共识:创办一份文学杂志,以“灌输文学常识、介绍世界文学,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”(引自《文学研究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

当此时,白话文已经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

1972年10月,杨冠珊致信叶圣陶,询问文学研究会诸事。叶老以78岁高龄,用毛笔正楷写了5页长函回复,对所询问问题一一作答。

冠珊先生惠鉴:

承赐长函,于昨日转到,读甚感。今提笔奉复,须先致歉,缘将使足失望故。

我年七十八,记忆力早衰退,近年尤甚。来示谓我于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知识》曾撰文叙文学研究会之事。此已全不记忆。今读尊书,仍仿佛记忆,然所叙者为何,莫从追想其分毫。惟有一事则记之极真:《文学旬刊》系附刊于《时事新报》,非《民国日报》之副刊也。

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生。当时邀集发起人,在北京成立,皆郑先生主之。曾有宣言一篇,是周作人所撰,刊于《小说月报》,今无从觅五十余年前之旧杂志矣。

我虽为此会之发起人,未尝参加其会议。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,未复举行其他会议。若是,则此会之组织松散,可以想见。其所以表现有此会者,惟在出一套丛书,以及编辑《文学旬刊》(后改为《文报(学)周报》而已。至于《小说月报》,则为商务印书馆所出,编者先为沈先生,后为郑先生,而非文学研究会之专属刊物也。

承提起《倪焕之》,良为愧然。如此幼稚浅薄之作,何足挂齿。手头乃无此作之存本,请言其所以。抗战期间,我迁川八年,曾于乐山遭日寇轰炸,所携全部烧毁,其中有开明版之《倪焕之》。解放以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重印此书,初以为取致甚便,未尝留存数册。乃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,此类书即绝迹,无从求索矣。深负足下之殷望,惶恐惶恐。

今就所示所问诸点奉答于下:

一、成立在于北京,其时为一九二一年初。沈先生时在上海,我时在苏州,皆未参加成立会。二、记得《文学旬刊》曾标明文学研究会编。后改《文学周报》,由开明书店印行。至于起迄时日及出版期数,皆未能作答。三、前已奉告确有一篇宣言。内容如何,全已遗忘。四、诸人或为原来相识之朋友,或为投稿者,因投稿而相识。孰为会员,孰非会员,我不能指称。缘当时并无入会登记表,亦无会员录也。五、本系极为松散之会,似无所谓分化。各走各的路,自会之成立以至后来,固常然也。

不能厌足下之望,于此再致深歉。即请大安!

叶圣陶

十月廿一日上午

信文明白如话,任何解释都似多余;只有一点,却有非补充说明之必要:改革后的《小说月报》,编者“先为沈先生”,“后为郑先生”,而“先”“后”之间,还有一个“叶先生”在,只是名义上主

文献文物中的文学研究会 ——从“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”说起

□许建辉

渐成风习,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所出书籍却仍以文言为多,终于导致销路日穷效益疲软。特别是其麾下的《小说月报》,自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(1910年8月29日)创刊后即风靡上海滩,不想却也为语言的老化而致使订户遽减。凡此种种,让“老总”张元济认识到文字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,随即携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专程由沪至京,登门拜望胡适以寻求扶危良策。胡适肯定了他们的改革动议,并支持这改革从《小说月报》开始,具体措施是主编换人,用提倡白话文的学者名流为《小说月报》主政。

商务印书馆掌门人抵京求援的消息,有朋友告知了郑振铎;郑振铎随即通过军界朋友蒋百里的关系,得以偕耿济之一起拜访了张元济和高梦旦,当面向他们毛遂自荐,表达了想投在商务印书馆门下,主持编辑一份新文学杂志的愿望。商务的两位决策人态度很审慎,“以文学杂志与《小说月报》性质有些相似”为理由拒绝了他们,“只答应可以把《小说月报》改组”(见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

遭遇拒绝,郑振铎反而情绪高涨,因为张元济要改组《小说月报》的打算,让他感到自己久蓄于心的想法,正在因此而变茫远为切近,变朦胧为真实:“先办一个文学会,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”。这是一个新的构想,新的构想又驱动了新一轮的奔波。所幸张元济更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干的人,他回沪不久,王统照即接到沈雁冰的信函,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方案,《小说月报》指定由他接编,“只是内容虽可彻底之,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适应”,所以它“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,并且也是成立以后就‘锋芒毕露’地成立了几个地方分会而地方分会又出版定期期刊的主要原因”(见茅盾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〉导言》)。

此后,《小说月报》俨然成为“文学研究会”的“机关刊”,其主要撰稿人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。在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及戏剧、儿童文学、译丛、创作批评、文学家研究、现代文坛杂述、读书杂记、随笔等栏目下,刊发了冰心的《超人》、许地山的《缀闻劳埃》、卢隐的《海宾故人》、王统照的《沉船》、叶圣陶的《潘先生在难中》、丁玲的《梦珂》、莎菲女士的日记、施蛰存的《涓子》、将军的头、穆时英的《南北极》、茅盾的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、《虹》,老舍的《老张的哲学》、赵子曰《二马》、巴金的《灭亡》等小说以及朱自清、闻一多、王统照、梁宗岱、徐铸、朱湘、汪静之、徐志摩、李金发等人的新诗创作。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金事,北洋政府“文官法”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团体,据说是对他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

因。1920年11月29日,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,郑振铎召集朋友们开会,“议决积极的筹备文学会的发起,并推郑振铎君起草会章。至于《小说月报》,则以个人名义,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,并以他(它)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,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”(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会后,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冰,报告了会议决议,并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学研究会。

1921年1月4日,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。会议通过了会章,选举了职员,宣告以周作人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郑振铎、耿济之、瞿世英、郭绍虞、孙伏园、沈雁冰、叶绍钧、许地山、王统照等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。12人中除许地山与王统照一为台湾省一为山东

省人外,余者的籍贯不是浙江就是江苏。其他姑且不谈,只就此事而论,江浙的一代“才子”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大,也可谓首屈一指了。遗憾的是最早参与文学研究会“蓝图”设计的瞿秋白,此时因远赴“俄乡”而与“发起人”失之交臂。为弥补这无可弥补的损失,郑振铎亲手将“瞿秋白”三个字写进了正式会员名单,并按登记顺序排号列为第“40”。瞿秋白归国后完成的《饿乡纪程》和《赤都心史》,郑振铎也为之收入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予以出版——此是后话。

1921年1月10日,《小说月报》第12卷第1期出版。期号虽仍旧序,主将却已换人——沈雁冰正式履职主编,亲手作《《小说月报》改革宣言》公告未来:“小说月报行世已来,已十一年矣,今当第十二年之始,谋更新而扩充之,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,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,两方面的决策人态度很审慎,“以文学杂志与《小说月报》性质有些相似”为理由拒绝了他们,“只答应可以把《小说月报》改组”(见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

遭遇拒绝,郑振铎反而情绪高涨,因为张元济要改组《小说月报》的打算,让他感到自己久蓄于心的想法,正在因此而变茫远为切近,变朦胧为真实:“先办一个文学会,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”。这是一个新的构想,新的构想又驱动了新一轮的奔波。所幸张元济更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干的人,他回沪不久,王统照即接到沈雁冰的信函,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方案,《小说月报》指定由他接编,“只是内容虽可彻底之,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适应”,所以它“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,并且也是成立以后就‘锋芒毕露’地成立了几个地方分会而地方分会又出版定期期刊的主要原因”(见茅盾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〉导言》)。

此后,《小说月报》俨然成为“文学研究会”的“机关刊”,其主要撰稿人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。在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及戏剧、儿童文学、译丛、创作批评、文学家研究、现代文坛杂述、读书杂记、随笔等栏目下,刊发了冰心的《超人》、许地山的《缀闻劳埃》、卢隐的《海宾故人》、王统照的《沉船》、叶圣陶的《潘先生在难中》、丁玲的《梦珂》、莎菲女士的日记、施蛰存的《涓子》、将军的头、穆时英的《南北极》、茅盾的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、《虹》,老舍的《老张的哲学》、赵子曰《二马》、巴金的《灭亡》等小说以及朱自清、闻一多、王统照、梁宗岱、徐铸、朱湘、汪静之、徐志摩、李金发等人的新诗创作。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金事,北洋政府“文官法”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团体,据说是对他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

因。1920年11月29日,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,郑振铎召集朋友们开会,“议决积极的筹备文学会的发起,并推郑振铎君起草会章。至于《小说月报》,则以个人名义,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,并以他(它)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,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”(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会后,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冰,报告了会议决议,并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学研究会。

1921年1月4日,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。会议通过了会章,选举了职员,宣告以周作人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郑振铎、耿济之、瞿世英、郭绍虞、孙伏园、沈雁冰、叶绍钧、许地山、王统照等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。12人中除许地山与王统照一为台湾省一为山东

仍是郑振铎。这是事实,无法忽略。叶老自己“遗忘”了,历史却永远铭记:1927年5月,时任《小说月报》主编的郑振铎为防政治迫害出境避难,逗留欧洲余岁。这段时间里,叶圣陶代理其主编之职,先后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刊发了胡也频、沈从文、戴望舒、施蛰存等人的作品,把一批文学新秀推上了文坛。1928年10月,郑振铎回到上海复任。由于两位“主编”的工作交接之确切时间与具体过程不甚了了,致使谁是1929年1月至4月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的《灭亡》之“伯乐”目前尚无定论,但《沙菲女士的日记》能于1928年2月“闪亮登场”,则毫无疑问全赖叶圣陶慧眼识珠。叶、丁友谊由此而来,终生不渝。1979年春天丁玲结束被放逐生活回到北京登门拜望,叶圣陶激动之余挥毫写下《六么令》一首:“启关狂喜,难记何年别。相看旧时容态,执手无言说……回思时越半纪,一语弥深切:那日文字因缘,注定今生辙……”

还有一点也须提及:书中谈到文学研究会的“组织松散”,言“其所以表现有此会者,惟在出一套丛书,以及编辑《文学旬刊》而已”。叶老此言,得到了茅盾的认同——在同样是致杨冠珊的信中,茅公写道:“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,实际并无组织活动,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西。先是《小说月报》为代用机关刊物,后来在沪会员会自费出版《文学旬刊》,最后连《文学旬刊》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,在沪会员止(只)负编辑之责。此外,则有丛书,由商务出版。这些事,都是郑振铎负责,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。”

文学研究会既因出版物之存活而存活,那就还有一份同样注明为其所编刊物不可“遗忘”:《诗》——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歌园地。《诗》——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中这样介绍它:“诗,月刊。民国十一(1922)年一月十五日创刊。刘延陵、叶绍钧主编。中国新诗社、文学研究会编辑发行。出版地上海。民国十二(1923)年五月十五日终刊,共出7期。”该刊“以发表新诗创作为主,兼及译诗和诗论。撰稿人除编者外有朱自清、俞平伯、王统照、郑振铎、徐玉诺、刘梦苇、汪静之、潘训、冯雪峰、冯文炳等。”

再看叶老此信,语言典雅,叙事简洁,态度真挚而诚恳,体现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谦虚谨慎淳厚质朴。他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,由此一路走来,始终坚守着以文学而为人生为社会的一份追求,兢兢业业地恪尽个人的一份职责。在《诗》之后,他又参与编辑和主持编辑了《中学生》《新少年》等刊物,为青少年“供给多方面的趣味与知识,指导前途,解答疑问”。新中国成立后更以教育部副部长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之尊,关注着“祖国花朵”民族未来的健康成长,“十七年”中所有统编教材可以说都倾注着他的汗水与心血。但他从不居功自傲,他的目光永远是那样恬静那样慈祥。短短一封书信,传递的是知识是教养是大师风范,读之仿佛又听见他在说:新少年好像树枝上的嫩芽儿,新少年又好像一条活活的小溪流。嫩芽儿最怕的是生机不畅,小溪流最怕的是流动不通顺。现在,春天来了,新少年应该合起来,我们要畅适地发展,把捉住光荣的将来!我们要通顺地前进,归到那汪洋的大海!

因,却并不妨碍他的《端午节》《社戏》《在酒楼上》等作品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。总之,由沈雁冰主政的《小说月报》犹如一方阵地,文学研究会借此集合起一支年轻健壮的文学新人队伍;《小说月报》为文学研究会提供驰骋空间,文学研究会为《小说月报》注入新的生命。二者相依相携,共同为创造新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然而,《小说月报》毕竟不是“文学研究会”的“机关刊”,对于文学研究会这个松散的学术团体来说,拥有一块能够理直气壮地树起自身旗帜的地盘,实在大有必要。于是又经郑振铎的一番奔波之后,真正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《文学旬刊》在上海诞生。该刊设论文、创作、译丛、传记、文学界消息、文艺丛报等栏目,发表的作品主要有:茅盾的重要论文《论无产阶级艺术》,徐玉诺、汪静之、焦菊隐、黄初初、徐铸、李金发、刘延陵、倪贻德等人的新诗,王统照、庐隐、叶圣陶、严教严、彭家煌等人的小说,朱自清、瞿秋白、王以仁等人的散文小品,熊佛西、顾德隆等人的剧本,歌德、海涅、王尔德、左拉、莫泊桑、普希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安徒生、泰戈尔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文,等等。

《文学旬刊》初创于1921年5月10日,终结于1929年12月22日,共出380期,历时8年又7个月。其间几次更名兼“易主”,具体情况是:问世时以文艺副刊形式附于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印行,出满80期后,从第81期起更名为《文学》,改为周刊;第172期起又更名为《文学周报》,脱离《时事新报》,由文学周报社独立发行,第251期起改由开明书店发行,第351期起又改由远东图书公司印行。主编名义上由郑振铎、沈雁冰、谢六逸、叶圣陶、赵景深等相继出任,而真正“始终负责者为徐调孚”(茅盾语)。但不论由谁主编,也不论由谁发行,该刊始终不改其志,坚持以丰厚的编辑刊发成果践行它初创时的《宣言》:“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坛中,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,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,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,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,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。”

像任何改革都不会风平浪静一样,《小说月报》的改革理所当然也遭遇到了抵抗与攻击。沈雁冰因为首当其冲受敌,不得不于主政两年后卸去主编职务。所幸接任者是郑振铎——《小说月报》仍然掌握在文学研究会手中。从1923年1月第14卷第1期始,至1931年向商务印书馆辞职止,郑振铎主编《小说月报》将近8年(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他曾远走欧洲避难,期间主编工作由叶圣陶、徐调孚二人代理,但主编名义仍属他所有),付出与贡献该是非同一般。其中与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壮大有直接、重大关系者,当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,编辑、出版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一事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2000年以前入藏的图书中,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初版本只有40余种,不到丛书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,但已包括小说、诗歌、

戏剧、散文、传记、文艺理论、作家研究、寓言与童话等多种类别。编辑者的大视野、大胸襟、大目标、大追求由此可见一斑。该丛书由1922年5月至1929年4月为出版繁荣期,起迄时间与《文学旬刊》之始终略有先后。入选作家作品既有“五四”文学革命初期的沙场老将刘大白及其诗集《旧梦》,也有被“五四”惊雷震上文坛的后起之秀冰心及其《繁星》《春水》,有徐玉诺的《将来的花园》,有李金发的《为幸福而歌》,有王统照的《春雨之夜》,有顾一樵的《芝兰与茉莉》,还有梁宗岱的诗集《晚祷》,张闻天的长篇小说《旅途》,罗黑芷的《醉里》,叶绍钧的《火灾》、耿济之译莫泊桑《遗产》,侯曜著《复活的玫瑰》《二马》《赵子曰》《老张的哲学》属老舍所有,《追求》《动摇》《幻灭》是茅盾的“三部曲”,鲁迅贡献的是译著《工人绥惠略夫》与《一个青年的梦》,郑振铎翻译了《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》……

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庞祖龙的《寒星集》,一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的合订本,1934年3月出版,印1000册,是“江南文学研究会发行”而非“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”。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,因为稀罕而弥足珍贵。“文学研究会地方分会”存在着并且有活动——它似乎在述说着这样一个事实,同时也证明着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的影响之深之广之被接受被喜爱,否则就没有有效的必要了。更有意思的是,该书封面上还有两行充满敬意的钢笔字:“先进作家谢婉莹先生指正 请赐批评并予介绍 庞祖龙敬赠”。按说它应该经由冰心之手捐赠文学馆,却不知为何竟跑进了“唐弢文库”中。

综上所述,关于文学研究会诸事,茅盾、叶圣陶两位“老会员”致友人